



宋代诗词故事

不畏浮云遮望眼

晏建怀

开栏语:

宋诗承唐诗而来,但并非唐诗的模仿。宋诗对唐诗似乎有一种抗拒模仿的下意识避开,故更深刻地钻研技巧和语言,别具一格。词是诗的别体,兴于唐而盛于宋,在“花间”和“南唐”之后而成一枝独秀。宋朝的诗人常常是词人,他们右手写诗,左手填词,创作的趣闻和唱酬的故事很多,散落于史籍、笔记、诗话、词话之中,如夜空中璀璨的繁星。即日起,《宋代诗词故事》开栏,与大家一起聊一聊宋代诗词背后的故事,一展宋代诗人、词人独特的风采。

北宋的王安石变法曾给予社会和官僚系统很大的震动,支持者不少,反对者亦多。然而,不论人们用什么眼光看待王安石和他的变法,但对他的诗,即便是反对者也青睐有加,如其政敌司马光便唱和过他的《明妃曲》。王安石的诗以思理见胜,技法精湛,自成一家,谓“王荆公体”。杨万里《读诗》云:“船中活计只诗编,读了唐诗读半山。不是老夫朝不食,半山绝句当朝餐。”就把王安石的诗歌当范本学习。

王安石,字介甫,号半山,抚州临川人,少聪慧,《宋史·王安石传》:“少好读书,一过目终身不忘。其属文动笔如飞,初若不经意,既成,见者皆服其精妙。”年轻时,他因诗文好得到一代文宗欧

阳修的延誉。庆历二年(1042),22岁的王安石进士及第,授校书郎,签书淮南节度判官。庆历五年,任满赴京述职,官制规定,官员任满可以献上自己的文章求试馆职,独王安石屡屡放弃。原因是他希望继续扎根基层,积累经验。

庆历六年,王安石知鄞县(今浙江宁波市),后迁舒州通判、常州知州、提点江东刑狱等职,直到嘉祐三年(1058),宋仁宗调任他为度支判官,他才入京就职。从22岁到38岁,他在基层整整干了十六年,而且都是主动要求的。他务实肯干,比如带领百姓修堤筑堰、完善交通等。他用新方法进行基层治理,比如春荒时在自愿原则下“贷谷与民”,秋收后加息偿还,解决百姓青黄不接的难题,使他们免受高利贷的盘剥。

他之所以扎根基层,注重实践,因为有着远大的理想,不单单是出将入相,而在富国强民。他的《登飞来峰》一诗便是这种理想的表达,诗曰:“飞来山上千寻塔,闻说鸡鸣见日升。不畏浮云遮望眼,自缘身在最高层。”不过,理想再远大,都要从零开始,一步一个脚印。所以那么多年,无论是翰林学士欧阳修推荐回京,宰相文彦博越次提拔,还是仁宗“召试”,他都拒绝了。他像医生坐诊一样,要把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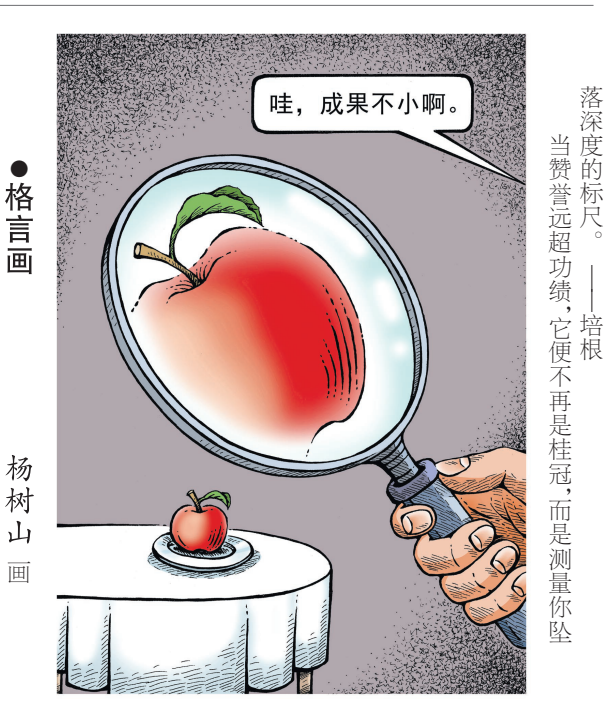
层的情况摸透,把病症摸准,为将来对积贫积弱的天下操刀积累经验。

王安石懂得基层,同情百姓,曾作《郊行》曰:“柔桑采尽绿阴稀,芦箔蚕成密茧肥。聊向村家问风俗,如何勤苦尚凶饥?”此诗与《兼并》“有司与之争,民愈可怜哉”,《促织》“只向贫家促机杼,几家能有一絢丝”等句异曲同工。

他还曾作《省兵》《收盐》《感事》《发廩》诸诗,对冗兵耗财、战斗力低下、食盐专卖弊端、土地兼并、豪吏盘剥等问题做出了深入

思考,提出了改革良法。“熙宁变法”中,他非常重视基层百姓的意见,曾向宋神宗建议:“议助役事已一年,须令转运使、提点刑狱、州县体问百姓,然后立法,法成又当晓谕百姓,无一人有异论,然后著为令。”(李焘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二百二十四)这是非常科学的执政方法。御史刘挚曾弹劾他说:“其(王安石)议财,则市井屠贩之人,皆召至政事堂。”(《宋史·刘挚传》)更证明了他方法的超前性,堪称擅长基层治理的一代能臣。

他的才华无时无刻不体现在政治上,倾注在国富民强的理想上。人们耳熟能详的写景名句“春风又绿江南岸,明月何时照我还”,有人说是写“愁”,这哪里是写愁啊,明明是写希望,这片改革春风所带来的“绿”,洋溢着勃勃生机,展现出希望的田野,也预示田野的希望。



格言画

杨树山画

落深度的标尺。——培根  
当赞誉远超功绩,它便不再是桂冠,而是测量你坠

云飞读小说

裹挟风雷的癫狂吼吼——简评智啊威《梦乡手记》

闻云飞

在当下四平八稳的小说叙事中,智啊威的小说辨识度挺高。他的小说侧重于表现现代人的存在困境。其小说运用了现代小说的夸张、变形、黑色幽默等荒诞手法,使得现代人的苦痛与压抑山呼海啸般排阔而来,让人产生强烈共情。

最近,在第5期《小说月报》上看到其新作《梦乡手记》。小说采用白痴叙事的手法,呈现出嬉笑怒骂皆裹挟风雷的情感冲击力。白痴叙事,即用白痴、疯子的视角来叙述文本,因其视角特别和非正常人的思维,往往能揭示某种真相,揭穿权威的虚无,展示“真实生活的虚伪”,并于无意义处发现真理。像鲁迅的《狂人日记》和美国作家辛格的《傻瓜吉姆佩尔》,即是这类小说的经典。

痴狂者大都为至情至性之人。小说中的“我”成为精神病人,即为丧女之痛使然。女儿病逝后,“我”的人生意义陡然悬空,整天瞎转悠,无处安放如此浩大的悲伤。“我”最终被逼来到岳父家的屠宰厂上班,负责清点

牲畜的头数。工作很清闲,为找点事做,“我”在镇书协贾主席指点下,练习怀素的草书。“我”在练习书法时,心沉其间,神入八荒,听到的牲畜叫声不再刺耳,而是听出了小说、诗歌、音乐的韵味,听到了“它们一生中的细枝末节,它们的爱情、它们的恐惧、它们的理想……”这一切都汇入笔下,“我感到自己的血液开始燃烧,手中的笔也更为夸张地挥动起来”,出神入化的创作之中,“我”禁不住加入“合唱”中,“一边写一边嚎叫”。

有人说,艺术家和精神病人只有一线之差。“草圣”怀素写书法时即“忽然绝叫三五声,满壁纵横千万字”。如果说艺术创作中最大的喜悦,就是创作过程,那么“我”着实体验到了。

在书法创作中,“我”还

想研究出更高级的“尿素体”。但贾主席却说“你触碰到了书法的大忌”。他扔给“我”一本厚厚的书。那本书写满了各种各样的“囚”字。“我”看后幡然醒悟,感觉每个人“无不囚禁在自己的框子里,像背负着命运的十字架”,既而“再也无法写那些轻飘飘的字了,再也忍受不住那些令人压抑的东西了”。“我”最终放掉了一车即将被宰杀的牲畜,“带领着它们”狂奔。

“我”是思女之情的俘虏,“我”是现实世界的弱者。岳父、妻子和周围人都瞧不起“我”,取笑“我”。“我”后悔看到那本“囚”字厚书——笔者也惋惜,主人公要是能将人生苦痛在书法创作中随着癫狂的吼吼释放出来,也算是一种解脱吧。这让人想起海子的诗句:“我

有三次受难:流浪,爱情,生存;我有三种幸福:诗歌,王位,太阳。”对于艺术家来说,精神上的幸福,往往视为现实苦难的某种心理补偿。但小说的结局更为写实,“我”最终奔逃而去——在“我”看来,只有动手拆除围墙堵心灵自由的框,将“囚”中的“人”解放出来,才有实际意义。

小说许多情节都显示出白痴叙事的非理性特点。有些黑色幽默的桥段,让人读后笑中含泪,对主人公产生共情。它勾起我们不时感到的压抑和无奈,我们无法确定的生老病死,我们各自人生中需要独自面对的痛苦和不幸……死生契阔,离合悲欢,让所有至情之人都有了成为“白痴”的可能。这种情况下,这篇小说即显出其独有的现实价值。它让我们看穿了阳光人生的另一面,触摸到了人生边缘的灵魂模样,让我们在主人公书写草书的吼吼声中——生一次,死一次,痛苦一次,痛快一次——为自己人生中的至暗时刻,找一个释放痛苦的口子。此为疗愈,亦是慰藉。

《水浒传》第二十七回“母夜叉孟州道卖人肉 武都头十字坡遇张青”讲述了武松替兄报仇,杀了潘金莲和西门庆,坐了两个月的监房后,被发配到孟州。此时,正是六月前后,炎炎火日当头,只得赶早凉而行。这天,武松同两个公差来到十字坡,再往前走便看到一个酒店,门前窗槛边坐着一个妇人,“眉横杀气,目露凶光,辘轴般蠢腰肢,棒槌似桑皮手脚。”头上插着一头钗环,鬓边插着些野花。见武松他们来到门前,站起身来迎接,说道,“客官,歇脚了去。本家有好酒,要点心时,好大馒头。”武松在江湖上曾听人说过“大树十字坡,客人谁敢去那里过?肥的切做馒头馅,瘦的却把去填河”。于是将妇人送来的馒头掰开一看,馅里似有人的毛发,更觉生疑,便假意与妇人调笑,以探虚实。这妇人本是开的黑店,杀人劫财,卖人肉包子,江湖人称母夜叉孙二娘,她怎肯吃亏,表面应付暗地里在酒中下了蒙汗药。武松接过酒碗说,“大娘子,我从来吃不得寡酒,你再切些肉来与我过口。”见那妇人转身入去,却把这酒泼在僻暗处。那妇人哪曾去切肉,只虚转一遭,便出来拍手叫道:“倒也,倒也!”那两个公人只见天旋地转,扑地便倒。武松也把眼来虚闭,扑地仰倒在凳边。那妇人见三人倒地,便先让两个汉子扛抬武松,见他们抬不动,就走上前

来,脱去绿纱衫儿,解下红绢裙子,赤膊把武松轻轻提将起来。武松就势抱住那妇人,拘将拢来,压在妇人身上。正在此时,只见门外来了一个挑柴的男人,跑将进来叫道,“好汉息怒,且饶恕了,小人自有话说。”此人正是孙二娘的丈夫,江湖诨号菜园子张青。武松自报家门后,这夫妻二人连忙跪拜,口称有眼不识泰山,冒犯都头。武松也忙施礼,说,“却才冲撞阿嫂,恁怪。”至此,一场误会,烟消云散。

据此故事编演的京剧《十字坡》,又名《武松打店》,是一出精彩的短打武生戏。当年武生名家李万春先生擅演武松,他在上演《十字坡》时由在《狮子楼》中扮演西门庆的武生毛庆来反串孙二娘。毛庆来是“四小名旦”毛世来的哥哥,武功出色,与李万春长期合作。他们在上演《十字坡》时

有两个绝活儿:一是武松把馒头连同盘子一起扔向孙二娘,孙二娘用扇子接住,一个不掉;二是二人对打时,孙二娘倒在台上,武松将两把匕首扔过去,扎在孙二娘脖子两边,惊险至极。

另一位武生名家盖叫天,本名张英杰,武松戏也非常拿手,他演的《十字坡》同样有“飞刀”绝活。上世纪40年代曾与盖叫天先生合作的武旦名家李金鸿虽然知道这手绝技,但真到台上时,发现那两把紧贴自己脖子的匕首,也是惊出了一身冷汗。

林徽因改名

杨方

林徽因的名字最初是“林徽音”,典出《诗经·大雅·文王之什》,是其祖父林孝恂从“思齐大任,文王之母,思媚周姜,京室之妇。大姒嗣徽音,则百斯男”中所取。

林徽因改名,也算是文学史上的一段公案。上世纪30年代初,林徽因当时已小有名气,经常有诗歌、散文发表,巧的是,竟然有位名叫“林徽音”的男性作家也有诗歌、散文发表。二人的名字仅一字之差,且“徽”和“微”字形极为相似。更巧的是,二人的写作风格也很相近。林徽音是新月派诗人,与新月派相互

来往很多,因此不仅读者容易弄混,编辑也常常把二人的作品“张冠李戴”。

据史料记载,为避免彼此有掠美或冒牌之嫌,1931年,徐志摩曾为林徽因在媒体上发布过一则声明:作者林徽音,是一位女士,作者林徽音,是一位男士,二者不是同一人。但徐志摩的声明并未解决根本问题,照样常常弄混。为了消除误会,林徽因在发表文章时,只好将署名改为“林徽因”,其最有名的《你是人间四月天》便署名“林徽因”。

林徽因说:“我倒不怕大家把我的作品当成他的作品,我只怕把他的作品当成我的。”如此看来,林徽因不仅有独有的傲气,也有超越常人的底气。